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视角下收入与生育的相互影响及协同策略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岗位少，薪资低，压力大”已成为日益加剧的问题，许多大学生毕业后面临找工作难，工资与学历不相匹配的局面，而社会消费水平的提高，许多年轻的已婚群体为了缓解自身压力，很多选择少生或者不生，这一现象逐渐加剧。基于此，国家政府在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出台了相关政策，发出号召：通过完善一系列政策，促进收入分配合理化，社会保障周全化，这些政策协同发力，以此促进收入与生育的良性循环，推动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对未来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将以二十届三中全会为节点，通过对社会情况的调研，探讨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相关政策的影响。

关键词：收入分配 生育意愿 政策完善 二十届三中全会

一、引言

在当代社会经济语境下，收入与生育之间的关系成为众多学科领域关注的焦点。深入理解这一关系的复杂性，对于制定科学合理的人口政策、经济政策以及社会政策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

二、收入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一）中国家庭的现状

中国家庭面临着收入与生育成本难以平衡的困境。以 2023 年数据为例，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9,218 元。

2023 年全国及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增速

| 居民类型 | 2022 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元） | 2023 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元） | 2023 年名义 增速（%） | 2023 年实际 增速（%） |
|------|----------------------|----------------------|-------------------|-------------------|
| 全国居民 | 36883 | 39218 | 6.3 | 6.1 |
| 城镇居民 | 49283 | 51821 | 5.1 | 4.8 |
| 农村居民 | 20133 | 21691 | 7.7 | 7.6 |

对于普通家庭而言，诸如家政保姆等能够减轻家庭照料负担的服务费用往往难以承受。这种经济压力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家庭的生育意愿，使得许多家庭在考虑生育时踌躇不前。

（二）不同经济状况下的生育意愿差异

1. 从经济基础保障看，高收入家庭有更强的经济实力来承担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成本，包括孕期的医疗保健、孩子的生活费用、教育经费等。如在孩子教育方面，高收入家庭能够轻松承担优质私立学校学费及各类兴趣班、辅导班费用，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因此更愿意生育。

2. 从生活质量维持看，中高收入家庭在生育后，更有能力维持原有的生活品质，不会因孩子的到来而使生活质量大幅下降。他们可以通过雇佣保姆、购买更好的育儿产品和服务等方式，来平衡生育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从而提高生育意愿。

3. 从职业发展影响看，高收入群体往往在职业上有更多的资源和优势，其职业发展受生育的影响相对较小。他们能够更好地协调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如利用公司的福利政策、灵活的工作安排等，来保障自己在生育后仍能保持较好的职业发展态势，所以生育意愿相对较高。

4. 从养老保障考量看，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对养老问题的担忧相对较小，不需要依赖子女养老。因此在生育决策时，不会将养老作为主要因素来考虑，而是更注重自身的生育意愿和孩子的成长质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使他们的生育意愿相对更强。

5. 多项社会调查研究也支持家庭收入与生育意愿呈正相关关系这一观点。如《家庭因素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及政策启示》一文指出，家庭经济收入越高，人们“生育孩子”的期望和“多孩生育”的期望都更高。因此，当家庭收入增加时，孩子作为一种正常商品，其需求也会相应增加。这是因为在这些地区，孩子往往被视为家庭劳动力的补充和未来养老的保障，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使得养育更多孩子成为可能。

然而，在现代社会，尤其是高收入群体中，情况则有所不同。随着收入的增加，部分家庭反而选择较低的生育率，甚至出现“丁克”家庭。这主要是由于高收入群体更加注重事业追求和个人生活品质的享受，他们不愿过早或过多地承担家庭责任，从而倾向于减少生育数量。

三、收入增加与生育率的非简单正相关

（一）理论与现实的背离

尽管传统理论认为收入增加会带动生育率上升，但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却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态势。在现代微观经济学家庭生育理论框架下，孩子在相对贫穷地区表现为正常商品，但在整体社会发展进程中，这一关系逐渐发生变化。

（二）高收入群体的生育考量

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收入增加与生育率关系复杂，并非简单正相关，具体有如下表现：

1. 收入增加但生育率下降

经济发展初期：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初期，人们收入水平提高，但生育率却往往下降。如许多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生育率普遍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趋势，这一时期，人们更注重生活品质和个人发展，倾向于减少生育数量以追求高质量生活。

教育与就业影响：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和就业机会增加，使其生育机会成本上升，从而导致生育率降低。据统计，在中国，高学历女性的生育率普遍低于低学历女性。2023 年，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为 0.8 左右，而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为 1.2 左右。

2. 收入与生育率的“U 形关系”

一些国家和地区呈现出收入与生育率的“U 形关系”。在收入较低时，生育率随收入增加而下降，但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生育率可能会上升。如美国人口调查局数据显示，年收入超过 20 万美元的家庭生育率呈上升趋势，而年收入在 5 万-10 万美元的中等收入家庭生育率相对较低。

3. 其他因素的影响

生活成本上升：住房、教育、医疗等生活成本的快速上涨，削弱了收入增加对生育率的积极影响。例如，据估算，在一线城市抚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成年的成本可能高达百万以上，这使得许多家庭即使收入有所增加，也会因担心无法承担高昂的养育成本而减少生育意愿。

社会文化观念转变：个人主义盛行、婚姻观念变化等社会文化观念的转变，使人们的生育意愿降低。如中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的生活，认为生育会限制个人发展和生活自由，从而选择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

工作与生活平衡难：工作压力大、缺乏育儿支持等因素，也会导致人们即使收入增加，也不愿生育。例如，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有超过 60% 的职场女性认为工作与育儿之间的平衡是影响其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因担心生育后无法兼顾工作和家庭，而选择推迟生育或减少生育数量。

由于以上因素的存在，高收入群体在面对生育决策时，往往选择降低生育率，以维持现有的生活状态和职业发展轨迹。

四、生育对收入的反作用

（一）女性生育后的职场困境

根据克劳迪亚·戈尔丁的研究，女性生育第一个孩子后，一到两年间薪酬差距开始逐步扩大。这一现象主要源于女性因生育而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导致职业发展中断。当她们重返职场时，由于需要兼顾照料婴儿和家庭，工作时长被迫减少，进而影响了工作效率和职业晋升机会，最终对工资收入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即所谓的“父母效应”。

五、社会制度和收入结构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一）社会制度的支撑作用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合理的教育资源分配、高质量的医疗保障以及友好的劳动市场政策等社会制度对于生育意愿的提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例如：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减轻家庭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负担，使家庭在考虑生育时减少后顾之忧；合理的教育资源分配有助于降低家庭的教育成本预期，提高生育的吸引力。

（二）收入结构的多元影响

从收入结构来看，不同收入层次的家庭对生育有着不同的态度。低收入家庭由于经济基础薄弱，难以承担生育和抚养孩子的高昂成本，因此生育意愿较低；中等收入家庭虽然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但担心生育会降低现有的生活质量，在生育决策上也较为谨慎；高收入家庭则更多地从个人发展和享受的角度出发，倾向于限制生育数量。

六、政策调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相关政策举措

近来，多地发布生育意愿调查报告，关于“人口”和“生育”的话题正得到越来越多的讨论。10月17日，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宣布，将开展一项关于家庭生育意愿和现实困难的抽样调查，以了解影响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并为完善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10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一系列措施，旨在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生育政策落地见效。育龄群体的婚育观念发生了新变化。

影响受访者生育意愿的原因 百分比（%）

| | |
|-------------------|------|
| 生育养育成本高，经济负担重 | 86.4 |
| 生育津贴、假期、就业保障落实不到位 | 40.4 |
| 无人帮助带孩子 | 37.1 |
| 担心个人事业发展受到影响 | 32.6 |

| | |
|----------------|------|
| 0 - 3 岁托育机构不健全 | 25.1 |
| 身体、年龄原因 | 24.6 |
| 家庭内部意见不统一 | 10.3 |
| 丁克一族 | 9.9 |
| 其他 | 9.9 |

注：选择“其他”的受访者认为还有“婚姻法对女性的保障不够”“工作压力大”“担心教育不好孩子”等原因。该调查为多选题，各选项加总不等于 100%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为解决收入与生育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方向和有力的制度保障，以下是对相关政策举措的具体阐述：

（一）收入对生育的促进策略

1. 提升生育意愿的收入分配改革：全会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以及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这一系统的收入分配改革，将使家庭可支配收入得到更为显著的增加。例如，在初次分配中，保障劳动者能获得更合理的劳动报酬，使其收入能更好地匹配其劳动价值，这将直接增强家庭负担生育、养育孩子成本的能力，包括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更优质的医疗保健条件等，进而有效激发家庭的生育意愿，促使更多家庭考虑生育二胎或三胎。

2. 保障生育质量的工资与分配制度优化：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这不仅能够提高家庭的整体收入水平，还能引导家庭将更多资金投入到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合理增长的工资能让家庭有更充足的资金用于改善生活条件、为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如提供更舒适的居住空间、更丰富的学习资源等。健全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则能鼓励人们通过多种方式增加收入，进一步为孩子的成长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从物质层面有力地保障生育质量。

3. 稳定生育期间收入的社会保障强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覆盖面。在女性生育期间，完善的社会保障能够确保劳动者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减少因生育导致的收入减少风险。例如，生育保险可以为生育期间的女性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偿，包括生育津贴、医疗费用报销等，使家庭在生育决策时无需过度担忧经济压力，从而稳定生育意愿。同时，扩大工伤保险覆盖面，能保障因生育相关意外或疾病导致的职业伤害得到合理补

偿；扩大失业保险覆盖面，则能在女性因生育暂时离职期间，为家庭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确保家庭生活水平的相对稳定。

（二）生育对收入的积极影响引导：

1. 劳动力供给与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从长期来看，适度的生育水平对于维持劳动力的稳定供给具有关键意义。全会强调了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而稳定的生育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当生育率保持在合理区间时，能够为经济增长持续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随着经济的增长，企业的生产规模扩大，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也会相应提高，形成良性循环。相反，如果生育率持续过低，未来劳动力市场将面临短缺危机，企业的生产经营将受到限制，经济的发展也会受到制约，进而对居民收入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2. 女性职业发展与生育支持政策协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如完善生育休假制度等。通过合理的生育休假安排，女性能够在生育后有足够的时间恢复身体并兼顾家庭与职业发展。例如，适当延长生育假，并确保休假期间的工资待遇和福利待遇不受影响，让女性能够安心调养身体，同时也有时间和精力照顾新生儿。此外，还可推行弹性工作制度，允许女性在生育后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更灵活的工作方式，如部分时间在家办公等，这有助于缓解女性生育与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减轻生育对女性收入的负面影响，使女性在生育后能够更好地回归职场，保持职业发展的连贯性，进而保障家庭收入的稳定。

（三）政策协同促进良性循环：

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积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这包括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建立生育补贴制度，加大个人所得税抵扣力度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1. 降低生育养育成本方面：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减轻家庭在生育过程中的医疗费用负担，如提供孕期检查费用补贴、分娩费用补贴等。同时，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扩大公立幼儿园的数量和规模，降低学前教育费用，缓解家庭的教育支出压力。对于养育孩子所需的生活用品、婴幼儿食品等，也可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降低其价格，从而减轻家庭的养育成本。

2. 建立生育补贴制度方面：设立专门的生育补贴基金，根据家庭生育子女的数量和家庭经济状况，给予相应的补贴。补贴可以用于支付孩子的生活费用、教育费用等，直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例如，对于低收入家庭生育二孩或三孩的，给予较高额度的补贴，以鼓励其生育意愿；对于中等收入家庭，也给予适当补贴，增强其生育的经济可行性。

3. 加大个人所得税抵扣力度方面：在个人所得税计算中，增加与生育相关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如子女教育费用扣除、婴幼儿照护费用扣除等。根据家庭实际支出的教育费用、照护费用等，按照一定的标准在税前进行扣除，从而减少应纳税额，增加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这不仅能够在经济上给予家庭支持，也体现了国家对生育行为的鼓励和支持。

这些政策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互配合、协同发力。一方面，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使家庭在经济上能够承受生育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提高家庭的生活质量和生育意愿。通过这种政策协同效应，形成促进生育和保障收入的良性循环，最终推动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七、结论

收入与生育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当代社会发展中一个极为关键且复杂的议题，深入探究其内在逻辑并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对于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从收入对生育的影响来看，当前中国家庭面临着收入与生育成本失衡的严峻挑战。正如2023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所反映出的，普通家庭在面对生育所需的诸如家政保姆等照料费用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这种经济压力成为抑制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不同经济状况下，家庭收入与生育意愿呈现出多样化的关系。在相对贫穷地区，家庭收入的增加会促使生育意愿上升；而在现代社会的高收入群体中，事业追求、个人生活享受等非经济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导致他们倾向于选择较低的生育率，甚至选择“丁克”生活方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以及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举措，无疑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了有力的政策导向。通过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能够有效增强家庭承担生育和养育孩子成本的能力，从而提高生育意愿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合理增长劳动者工资，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不仅有助于提高家庭的整体收入水平，还能引导家庭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从物质层面有力地保障了生育质量。此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覆盖面等措施，能够在女性生育期间为劳动者提供全方位的权益保障，显著降低因生育导致的收入减少风险，使家庭在进行生育决策时不再有过多的后顾之忧，从而进一步稳定生育意愿。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如完善生育休假制度等，这对于缓解女性生育与职业发展之间的尖锐矛盾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通过合理的生育休假安排，女性能够在生育后获得充足的时间来恢复身体机能，同时更好地兼顾家庭与职业发展的双重需求。

这不仅有助于女性在生育后顺利回归职场，保持职业发展的连贯性和稳定性，而且能够有效减轻生育对女性收入的负面影响，从而保障家庭收入的稳定来源。

综上所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举措，精准地把握了收入与生育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与关键矛盾，并通过系统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实现了收入政策与生育政策的有机协同与深度融合。这种政策协同效应能够在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的同时，显著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成功构建起促进生育和保障收入的良性循环机制，为推动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撑。然而，在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仍需密切关注社会经济环境的动态变化，及时收集和分析政策执行效果的反馈信息，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和优化政策细节，确保政策的有效性和适应性。只有如此，才能在不断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妥善处理好收入与生育之间的复杂关系，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双赢目标，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人口基础和经济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二十大报告辅导百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②宋晓梧：《如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N]。《中国日报》，2021-10-09(01)》
- ③国家统计局：《2024年上半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R/OL]。北京：国家统计局，2024-07
- ④财政部：《个人所得税改革成效与展望》[R/OL]。北京：财政部官网，2020-12
- ⑤克劳迪亚·戈尔丁：《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7月
- ⑤事成周勇：《社会制度与收入结构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简书社区》2024年2月